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1.6万将士悲壮的留守

留守红军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

留守期间，瞿秋白、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党和红军许多知名的领导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

本报记者李兴文、赖星、黄浩然

4月8日，大余县池江镇老人刘士华在家中看母亲周篮的老照片。 王凯丰摄

留守红军，一个被掩藏在时光里的名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1.6万余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这是英勇壮烈的浴血坚守。孤悬敌后，九死一生。瞿秋白、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党和红军许多知名的领导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红军将士在绝境重围中坚定革命信念、艰苦奋斗、依靠人民、视死如归，这种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1937年冬，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前赴后继奔向抗日前线。

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江西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如一块棱角分明的白岩，被延绵的青山环抱，一幅历史的长卷在此间无言地铺展。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告别红都瑞金。送行的乡亲和战士依依惜别。留下来的同志，相顾无言，百感交集。

长征前夕，中央便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其中，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人组成。

“大家既关心主力红军的去向，更关心中央苏区今后的命运。”时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后来在书中回忆，当年19岁的他也是留守者的一员。

这些留守者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死亡之师”，其中包括1.6万余名红军将士、游击队员和数万名伤病员。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伪装成主力部队，迷惑、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掩护主力红军突围。

“留守红军牵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与红军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办主任胡日旺说。

历史细处不忍卒读，一旦翻开，可能每一个字都带着血痕。

从1934年11月瑞金失守至1935年2月，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几乎全部沦陷，许多村庄被杀绝户，青壮年遭受“断代性”的牺牲。

史料记载，福建长汀县楼子坝村34户人家143人，除一名八旬老妪外出探亲幸免于难外，全村被屠戮殆尽；赣州市烈士10.8万余人，其中约半数为苏区沦陷后被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

“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地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陈毅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央苏区沦陷的景象。

1935年2月，留守红军在于都被敌人重兵围困。危急关头，项英、陈毅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指示，组织留守红军九路突围。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85岁的南昌大学退休教授刘勉钰是最早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的专家之一，回忆起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他忍不住掩卷叹息。

59岁的革命长者何叔衡在从于都转移至闽西时牺牲。由于牺牲的人太多，很少有生者带回死者的消息。鲜有人知道，这位党的创始人牺牲时的具体情形。

瞿秋白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劝降不为所动：“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36岁的瞿秋白在一处绿草坪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尔后从容就义。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作为未能参加长征的人，他们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远征。

紧紧依靠人民

6月的大余，是一幅饱蘸着生命繁华的画卷。

当年他就义之地，已树立起英雄的丰碑。1935年3月，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在突围战斗中负伤被捕。被敌人押解游街的他，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大庾（今为大余）人潮涌动的街市。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刘伯坚的意志并没有被敌人的有意羞辱所摧毁，这位内心坦荡的革命者写出了不朽的《带镣行》。

牺牲前，刘伯坚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如今，大余县伯坚大道，车流如织，尽头便是幸福大道……人民将刘伯坚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这片他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上。

“只要紧紧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这在三年游击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大余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朱常说。

为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他们通过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手段，将老百姓集中到平原，禁止群众随意进山。

游击队把做好群众工作当生命线，在他们看来，越是困难时候，越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据一些游击队员回忆，当地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进山砍柴机会，将粮食、食盐、情报等藏于挑柴的竹杠中送给游击队，有村民因此遭到敌人的严刑拷问，但他们毫不畏惧地说：“我们要死就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害共产党。”

在大余县池江镇，86岁的刘士华多年来守护着自家的老屋，也守护着父母的记忆。他的母亲周篮经常为游击队送饭、购买物资、探听敌情，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其为“周篮嫂”。

“国民党把我父亲打成重伤，用火烧母亲的头发、打断她的手指，逼问他们游击队员的下落，但他们没有透露丝毫。”刘士华说。

游击队员有时到群众家里去探望，看到他们有的被打断腿，有的被打掉牙，有的则被烧了房子，却依然毫无怨言地支持共产党，没有人不感动流泪。

人民，哺育了绝境中的红军将士。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情，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他所言：“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信仰在生死考验中淬炼

梅关虎踞梅岭，一关分隔南北。

千百年来，梅关古道承载着南来北往无数人生的悲喜，留下了古往今来无数历史的印痕。转战于此的游击队员，则用他们的浴血坚守，书写了自己的红色传奇。

1936年冬，赣粤边陲。衰草、冷月、追兵。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中，陈毅负伤带病藏身在梅岭的草莽之中已二十多天。他料定自己凶多吉少，于是写下绝命诗《梅岭三章》藏在衣底，准备就义赴死。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游击队员们孤悬敌后，在狂风暴雨中飘摇，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下，红军和游击队被困在深山密林里，昼行森林、夜宿山洞，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像野兽一样生活。

1936年寒冬，项英、陈毅、陈丕显、刘建华4位游击队领导人被迫隐蔽在一处高山上，4人背对背靠在一起，用仅有的一条破旧毛毯围裹，互相以体温御寒。

“他们的衣食住行极其艰难，我父亲和战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共用一条裤子，两人轮流穿着。”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刘鲁明说。刘鲁明的父亲刘建华当年是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游击队一有机会就组织战士学习，他们想方设法收集书报，学习国文、算数、军事理论，注重分析形势和前途。有一次，敌军士兵在搜捕游击队员时，捡到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头竟装着书籍。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信仰的力量，是共产党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抗日战争的战鼓越擂越响。1937年10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铁军出山，改编为新四军，走上抗日前线，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继续书写人民军队的英雄传奇。

从逆行逆袭到逆转：“白色”档案解密新四军的战斗

本报记者蒋芳、邱冰清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是国内专门以“民国档案”为馆藏的权威档案保存和研究机构。记者近日在该馆采访发现，这些档案从另一个视角，揭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砺挫折中成长，在克敌制胜中壮大的非凡历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是如何记载的？秘密电文的往来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密电中的“逆行”轨迹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军事档案中，与新四军相关的档案尤为丰富。从1938年4月在皖南岩寺组建成军、接受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点验，随即奉延安命令开赴苏皖敌后作战；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前，新四军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不断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三战区报告敌情，以及其在敌后对日伪军、叛军等大小战役作战的战况。初步统计约有1130余件电函及报告文档，总页数超过3000页。

例如，有这样一条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转报第二支队将士袭扰南京题（安）德门的密电：1938年9月27日晚，新四军张支队“选派忠勇将士数人化装混入南京题（安）德门张贴标语、布告，并于归途捕获敌探一名，获驳壳一枝，敌伪当晚宣布特别戒严，连日断绝交通不准入城，恐慌异常”。前一日晚，该支队在群众配合下破坏了江宁禄口桥，并埋设地雷，将来修桥的敌人炸毙30余名。

今天来看，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出发，乘地铁前往雨花台区的安德门，仅4站路程。但在80多年前，南京保卫战失败，国民党主力部队撤离后，这条“逆行”的轨迹意义非凡。

近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相关馆藏档案时，发现了新四军对日伪统治的南京的作战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处副处长孙莉说，新四军进入江南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直逼敌人老巢，展开高频率的袭敌行动，不仅使敌人陷入恐慌，更提振了百姓的信心。

例如，麒麟门、沧波门、高桥门都位于南京主城区，1938年，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报告了8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一部袭击南京麒麟门的情形：“南京附近经我连次袭击后，敌伪异常恐惶，一日数惊。汗（汉）奸傀儡多准备逃沪。”另一些电文中这样写着：1939年5月4日，“四团一部于支晚进击至南京附近沧波门北，烧毁敌汽车一辆”；16日晚，卢团袭击南京高楼门之敌，“将其大部歼灭”，此役“敌伤亡卅余”；“我军达到南京地区后，民众极为兴奋，军行所至，常有数百武装民众配合行动，抗敌情绪极高”……

对此，国民政府也多次向新四军发出嘉奖令。1939年3月10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报新四军战况说明：自进入战区到1939年1月底，新四军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奋勇作战，歼敌3651名，俘虏敌伪823名，我方伤亡903人。报告并对新四军战术等进行总结归纳，得到国民政府高层重视。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均对此作了批示。

战斗数据佐证实力“逆袭”

“新四军实际上每天都在打仗。”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多次强调过的一句话。但国民党方面一直诬称新四军“游而不击”。档案见证历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过整理馆藏战斗详报中的大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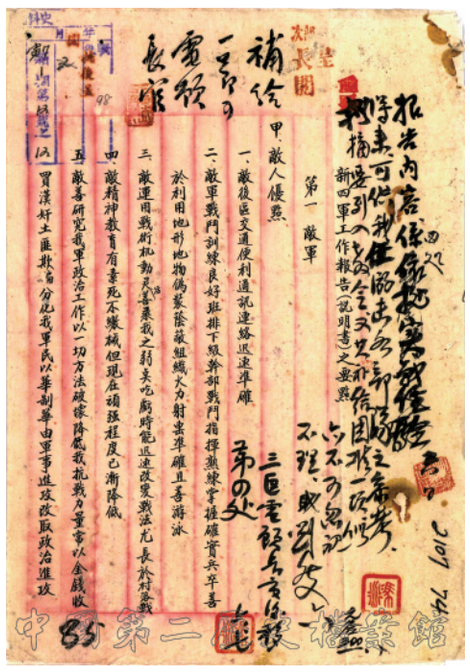
——新四军在从1938年4月组建到1940年12月有记录可查证的33个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方面提交了217份正式的战报与报告，平均每4天就有1份，其中还未包括其他的文件及其所涉及的作战情况报告。

——每份战报多包括数次乃至十数次战斗、破坏行动或所侦测到的敌情。共计对日伪作战1428次，毙伤消灭敌军21567人，俘虏2371人。

——平均每天作战1.4次、消灭敌人21.5人、己方伤亡6.5人。

翻开这些战斗详报，还能看到新四军“每天都在作战”的更多细节。

1938年6月1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奉令派兵挺进南京至镇江间，破坏敌后交通，限3日内完成任务。11日下午，粟裕率部从溧水冒雨出发，急行军200里，15日拂晓抵达句容，当晚破坏铁路40米，并向下蜀火车站日军发起攻击。16日上午，粟裕派出8个班兵力到达镇江西南30里的韦岗。17日上午以猛烈火力袭击日军汽车队。这就是著名的“韦岗战役”，此战拉开了新四军进入敌后抗战的序幕。这场战斗的胜利使江南百姓看到了希望。



新四军工作报告（说明书）之要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图

在苏皖敌后，新四军不时出击。“1938年7月4日，陈支队率部破坏江南铁路、切断采石矶至铜井间3座铁桥及南京到镇江、秣陵关公路；7月5日，他们又袭击丹阳城；同日，张团则袭击了南京东善桥的日伪军……”

“战斗详报中披露的数据和细节，表明新四军牺牲巨大、战果显著。以武汉会战为例，在1938年6月至10月的战场上，有统计的130天中，新四军作战多达108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说，这些战斗规模虽不大，但从敌我伤亡的比例来看，对敌人的杀伤力是较高的，战斗效果也非常显著。

除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作战，新四军还参与剿灭叛军武装，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四军爆表的战斗力也获得了更多嘉奖。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都曾多次在战报上批示，表扬新四军的战绩，并要求国民党军队效法、推广新四军在敌后的战斗经验。例如，1938年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嘉奖新四军“蒋家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1938年7月6日，蒋介石回电表扬新四军“该军深入敌后破坏交通摧毁伪政权，殊堪嘉尚”。1939年4月24日，蒋介石曾致电叶挺、项英：“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人心向背推动战局“逆转”

新四军纪念馆坐落于盐城市建军东路，纪念馆广场的纪念碑正上方镶嵌着蓝色“N4A”臂章，背后则镌刻着“盐城会师记”，它们和纪念馆中的老照片、望远镜、粗布鞋袜一样，一同见证着那史诗般的过往。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同年1月，中共中央下令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陈毅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曾这样说道：“举行庆祝军部成立的大会，这在中国抗战中，革命史上以及将来都是一件大事。”事实证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打退国内反共和投降逆流起到重要作用，也成为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积小胜为大胜的重要转折点。

重温档案，更能从战局逆转的前后对比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志。

“邻近友军限制我军通过，致弹药补给困难。米价涨至每元十三斤，士食不饱，经济无法维持，每班毯子四床，衣服破烂，且无雨衣，致影响军纪不整。”这是叶挺在1939年3月10日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报的新四军战况。他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时勉励将士，在给养贫乏、军需穷困、械弹劣少的条件下，依靠大家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武器落后是限制新四军兵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有资料显示，新四军成立时，国民党核定的发放物资中军用品仅包括五瓦特无线电机5台。日本满铁调查部曾在报告中提及：“新四军的装备非常恶劣，比八路军更差。步枪不能普及全员，机枪也非常少，至于炮，仅有迫击炮的部队为数也很少。”

新四军战士的武器从何而来？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记录中，新四军改编之初，武器主要来源于红军、农民手中原有的武器和国民政府的少量拨付。1938年4月，新四军在安徽成立了自己最早的修械所，主要修理枪械，同时制造大刀、手榴弹等，生产设备较为简陋。1941年，新四军自己的军工部在盐城成立。当年10月的一份有关新四军军工部成立经过及生产情形的档案，清楚记录了其下设部门、发展态势、工厂管理的教训以及有关技术的经验。

补充军需可以靠“自我造血”，战局逆转的关键更来自人心向背。马振犊说，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驰骋大江南北、纵横敌后战场，韦岗初战、黄桥决战、白驹会师、车桥大捷、两淮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创建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苏皖解放区，筑起了“华中人民的长城”。从建军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1万人。

近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在馆藏档案中首次发现了新四军女宣传员周杰（喆）的事迹。据其被捕后日伪军对其进行审讯的记录所载，她表示忠诚自己的信仰：“加入共产党至死不改变的。”日伪军官劝其说：“你既来此我可优待人，俟你觉悟我再问你。”她说：“若教我反共我是做不到的。”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1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认为，国民党档案中的新四军成长史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发展缩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等腐败乱象频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呈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欣欣向荣之景象。

1948年，英国《每日快讯》就国民党贪污腐败、统治无力进行报道。同年，《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北平师生大多倾向共产主义的报道，“在北平大学里，很多学生和教授都坚定地转向了共产主义……一年前估计有五成以上的北平大学生支持共产党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变为百分之七十。”

“国民党自身对于自己的缺点，并非一无所知。但其结构缺乏自我纠偏改错的机制，其领导人本身更是明知问题存在而无能为力。”张生说，从蒋介石日记到他在台湾执政期间，曾数次总结过共产党为何胜、国民党为何败的若干原因。归根结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是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11185 广告部电话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529号 定价：每份1.35元 年价324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13901102545